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山东元明散曲

王少华　张　达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山东元明散曲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illegible]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illegible]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illegible]号

印　　刷

版　　次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illegible]版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第 [illegible]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illegible]毫米 [illegible]

　　印张 [illegible]　插页 [illegible]　千字 [illegible]

印　　数　[illegible]

定　　价　　元

目　　录

一　元明散曲在山东…… 员
二　元代散曲山东作家群 …… 员苑
　㈠ 东平路的散曲作家…… 员苑
　㈡ 济南路的散曲作家…… 圆愿
三　张养浩与《云庄乐府》 …… 源缘
　㈠ 从出生到出仕…… 源远
　㈡ 从地方到朝廷…… 缘圆
　㈢ 辞官归里…… 缘缘
　㈣ 陕西赈灾…… 远员
　㈤《云庄乐府》的魅力 …… 远缘
四　济南：明代山东散曲创作的中心 …… 苑源
　㈠ 李开先的散曲创作…… 苑远
　㈡ 济南地区的其他散曲作家…… 愿源
　㈢ 李开先及其“词会”的影响…… 怨员
五　明代山东其他地方的散曲作家 …… 怨缘
　㈠ 中东部的散曲作家群…… 怨远

（二）其他散曲作家 …… 园
六　冯惟敏：明曲第一人 …… 缘
（一）随父宦游 …… 远
（二）蛰居乡里 …… 愿
（三）五秩出仕 …… 缘
（四）晚年归田 …… 园
（五）北曲本色 …… 苑
七　结语 …… 员

一　元明散曲在山东

“唐诗、宋词、元曲”，这是文学史家对三个朝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的简要概括，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常识。“元曲”，本应包括元人的“杂剧”和“散曲”两大部类。限于本书的写作任务，不涉及前者，仅关注后者。而就“散曲”来看，其实“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恰恰概括了我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相关历史。再就散曲创作本身来看，元代即达到了极盛，明代又有新的发展与成就（后延续至清代，仍有不少作品），所以文学史上又有“元明散曲”之称。

早在1931年，研究元明散曲的专家梁乙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部《元明散曲小史》，开篇就对元明散曲的成就和地位作了充满感情的概括。书中这样写道：

在元明的文囿里，除了诗词、戏曲、小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之外，“散曲”便是当中的一棵奇葩。它是继词而兴的一种“新诗体”，它的起来把恹恹无生气行将荒芜了的词的文囿，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使之重新开放出锦绣灿烂的花朵。它能使人兴奋，它能使人愉快，它能使人欢喜赞叹手舞足蹈起来。许多的大诗人们都放弃了他们所擅长的有固定形式的词来运用这种“新诗体”以抒写他们的情感了。许多的戏曲家们，也使用着这种名为曲的“新诗体”，成为他们的戏曲中可唱的一部分了。散曲到了这时，已是轮将薄中天的太阳，照射出万丈的光芒，无处不在它的笼罩里。它又是位年已及笄的妙龄少女，更无处不显示着高洁与可爱的丰满的姿容。假如说两宋是词的“黄金时代”，那么元明便是散曲的“黄金时代”了。

梁乙真先生的这一番概括，应该说是允当的。

在我国古代，所谓“曲”，就是指可以配上乐谱歌唱的歌曲，其文字部分就相当于后来的“歌词”；而所谓“散曲”，最初是指金元之交配合特定的音乐用以演唱的歌曲，甚至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讲究与音乐的结合，“诗”也就是“歌”。例如，最早的《诗经》，其中的《雅》、《颂》就多属庙堂乐歌，《风》则是民间乐歌；从汉代开始采集的乐府诗歌，本来也都是民间乐歌。可见，

“诗”、“歌”合一的传统在我国非常悠久。但是，由于后来的诗歌创作逐步走上了文人化的道路，逐步脱离了音乐，所以在最为辉煌的唐诗的时代，便又出现了配合燕乐专门供人们歌唱的“词”，并在有宋一代走向了新的辉煌，这就是“宋词”。这种现象说明，诗歌创作如果重“诗”而轻“歌”，甚至有“诗”而无“歌”，就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难以满足民间的需要。就此而言，“曲”之所以会“继词而兴”，也无非是因为宋词的发展最终走上了脱离音乐的文人化的道路。这是从创作体裁的流变来看，此其一。其二，散曲创作之所以会在元代得以兴盛，当然还与这个朝代的民族特点有关。众所周知，元朝是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的一个朝代。蒙古民族自古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性格豪放粗犷，酷爱歌舞，甚至可以说歌唱已经成为他们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民族性格与习尚，无疑是催生散曲的关键性前提和因素。我们从散曲的曲牌中可以看到，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唐宋的词牌，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蒙古或其他北方民族的歌谣俚曲，故散曲也被称作“词余”和“北曲”、“北乐府”、“今乐府”等等，足见其与两者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当然，散曲与过去的词毕竟不同，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从内部规则看，散曲虽然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句式、谱式之类，但又允许在用字、用句、用韵等方面有所增减、

变化，而不必像填词那样拘泥；第二，从结构体式看，散曲可分为小令（包括带过曲）和套数两类，小令由一个曲牌构成，带过曲由两三个曲牌构成，套数由两个或更多的曲牌加尾声构成，这也与每首词作只能由一个词牌构成不同。显而易见，散曲比词具有更为本色、更为灵活、更为便利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无非都是为适应歌唱的需要而形成的。

在元明散曲的创作中，山东称得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

金元之交，散曲方兴，长清（今属山东济南）人杜仁杰就已经是一位散曲大家，他的创作以善谑和风趣的风格自成一家，闻名于世。稍长于杜仁杰的商衜和稍后于杜仁杰的商挺，都是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也都是散曲名家。其他如东平（今属山东泰安）人王修甫、徐琰，长清人严忠济，淄川（今属山东淄博）人奥敦周卿，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刘敏中等，也都有散曲作品行世。可见元代前期就已经在山东形成了一个创作力量雄厚、创作规模可观的散曲作家群。此后，祖籍章丘，长期生活在历城（今属山东济南）的张养浩，不仅把山东的散曲创作推向了高峰，而且在整个元曲创作中独树一帜，称得上是元代散曲创作的一流作家。到了元代后期，山东的散曲创作中心出现了东移的迹象，益都（今山东青州）人王廷秀、刘廷信，青城（今山东高青）人杨朝英等创作

的散曲都可谓闻名遐迩。尤其是杨朝英，更称得上在元代散曲史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不仅自己从事散曲创作，而且编选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两部散曲作品集，保存了关于元代散曲的许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贡献颇大，史称“杨氏二选”。

到了明代，山东的散曲创作可谓势头未减，涌现出了贾仲明（淄川）、杨应奎（章丘）、袁崇冕（章丘）、刘守（济宁）、李开先（章丘）、冯惟敏（临朐）、刘效祖（滨州）、高应玘（章丘）、王田（济南）、王克笃（东平）、薛岗（益都）、丁彩（诸城）、丁惟恕（诸城）、孙峡峰（安丘）、叶华（曲阜）等一大批散曲作家。这些作家在山东的地域分布比之元代更加广泛，而且他们的散曲创作活动还贯穿了整个明代的历史，这在散曲创作中心已经移向江南的背景下，称得上支撑起了北部的局面，从而使之经久不衰。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明代的山东散曲作家群中还产生了李开先、冯惟敏、刘效祖这样的大家，就是把他们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李开先是明代文坛上的“嘉靖八子”之一，不仅自己的散曲创作影响很大，而且在故乡章丘带动团结了一个散曲作家群体。冯惟敏与李开先志趣相投、交往甚厚，而且出身历代书香世家，与其兄弟惟健、惟重、惟讷皆有诗名，他们的后代也有不少以诗文传世者。

刘效祖的散曲创作，风格独异、传诵一时，在当时的文学地位也很高。总之，元明两代山东的散曲创作，无论是作家阵容，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可以叫得响的，因而也是应该受到重视的。本书就是想以此为专题，对于这一方面的文化历史以及散曲家们的创作面貌做一点必要的梳理、研究和论说。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那么，为什么元明散曲创作能够在山东得到这样巨大的发展，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呢？对此，我们可以从散曲的创作环境和作家的创作心态这样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说明。

创作环境问题，尽管关涉着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但说到底是一个文学接受者的多寡问题，也就是文学市场问题。历史事实可以说明：某种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无非是因为它有着广大的、长盛不衰的市场；反之，某种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凋零、衰败，也无非是因为它的市场疲软、萎缩。人类社会越是发展，文化传播越是进步，这样的一条规律也就越发看得清楚。山东的元明散曲创作当然也是这样。这一方土地之所以会成为散曲创作的重镇，首先就与它在元明两代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关。

元代开国以后，将所辖版图划分为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两个大类：京城大都（今北京）所在的地区为中书省，包括今河北省和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

山西省的部分地区；其余则被划分为 5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当时，为了强调中书省地位的重要，这一地区还被称做“腹里”。这样的最为基本的行政区划设置表明，当时的山东地区是被视为京畿地区的，这自然非同寻常。

依照元代的行政建制，还在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下设“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级行政机构。就山东的散曲创作而言，当时的东平路和济南路当格外值得注意。东平路治须城（今山东东平），金代属于山东西路，元初改为东平行台，后又改为散府、下路总管府，领须城、东阿、阳谷、汶上、寿张、平阴 远县，所辖涉及今山东的济宁、泰安、济南、德州等地区，是元代山东西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上元代又在大运河的山东段开凿了从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更使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济南路治历城（今属山东济南），元初即设总管府，后所辖经过多次变动，领历城、章丘、邹平、济阳 源县，棣州、滨州 圆州；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领厌次、商河、阳信、无棣 源县；滨州治渤海（今山东滨州），领渤海、利津、沾化 猿县。济南路所辖涉及地区更广，是元代山东中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于元初游历东平和济南，他在其《游记》里就盛赞这两地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城市。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东平、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南的城市繁荣、人口众多，才有可能为散曲创作提供足够广阔的文学市场。

金元交替时期，社会动荡不宁，而东平和济南地区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为散曲创作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当时，东平一带的汉族统治者严实是长清（今属济南）人，济南一带的汉族统治者张荣是历城人，他们都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而且又都较早地依从了蒙古人，故元朝开国之后分别被封为东平路行军万户和济南路万户，并准予子孙世袭，史称“汉人世侯”。严实和张荣的做法，在客观上当然有利于东平路和济南路社会的稳定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实还是一个非常注重搜罗知识分子、喜欢接纳儒生文士的人，乃至令名远播，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元初的著名学者如宋子贞、刘肃、李旭，著名文学家如元好问、王若虚，著名散曲家如杜仁杰等，都曾到过东平，并在这里居住。这些著名学者，尤其是著名文学家、散曲家的活动，必然会为东平、济南地区的散曲创作带来更为直接的有益影响。

到了明代，基本沿袭了元代旧制，各地方以行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洪武元年（1368），设山东行中书省，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洪武九年（1376），各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山东治所也随之改为济南，恢复了其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元明

愿

之交，虽经战乱破坏，山东仍属经济恢复较快、较早的地区；不久以后，又疏浚了大运河的山东段——会通河，疏浚了大、小清河，也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当时，这里的矿冶业、纺织业、制盐业等等都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地区，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也日趋繁荣，出现了许多商业发达的城镇。其中，济南到青州两府之间的鲁中地区就是如此。在明代，山东的散曲创作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也可以说与此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文学史上，如果说最早出现的诗歌、散文创作更多的是与接受者个体直接发生关系的话，那么，后来出现的小说、戏剧和作为“流行歌曲”的散曲创作，则显然更多的是与接受者群体直接发生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往往是通过舞台表演来实现的。白话小说依赖“说话”艺术的“话本”而催生，杂剧和散曲更是直接面对观众和听众。如此说来，这些文学样式的创作就不能不直接面向接受者群体。所以，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也必然要以接受者群体的出现和扩大为前提，也就是必然要以人口高度聚集为前提。毫无疑问，要走到这一步必须依赖城市，依赖市民的生活。城市经济繁荣了，城市规模达到相当水平了，市民们普遍要求享受娱乐生活了，说话、杂剧、散曲等等才会有市场，才能发展繁荣。上面我们之所以说到

了元代的东平路、济南路，明代的济南府、青州府等等，就是因为这些城市应该被看做山东散曲创作发展繁荣的最为直接的前提条件，也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外部生长因素。在长篇小说《金瓶梅》里，多处写到了大户人家在喜庆节日里叫“唱曲的”来演唱散曲的场面，还说潘金莲接受过散曲弹唱的专门训练，能够弹唱不少的曲目，这也反映出，在明代，散曲演唱已经成了遍及各地的经常性的娱乐形式。据《元史·礼乐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朝廷曾经一次“召东平乐工凡四百二十一人”进京，可见当时东平的演出市场已经颇具规模。明代的李开先也曾写过一部《词谑》，书中的《词乐》部分记载了当时许多说唱演员的故事，其中就包括一些山东人。例如，“徐州人周全，善唱南北词……曾授二徒，一徐锁，一王明，皆兖人也，亦能传其妙。”“乐人济南张庆……弹唱皆妙，可与之为敌者……皆不能及。”“济南胡春，无论其弹唱，只以鹅管作笛，有穿云裂石之声，名为‘欺压乐官’，素长于竹声者，惟旁观叹羡而已。”其余还提到“曹州安廷振”、“曹县伍凤喈”、“兖府周卿”、“济宁周隆”、“临清崔默泉”等等。另外，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记载的“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中，也有临清人王子敬、济宁人胡惟中。这些著名演员的出现，无疑说明了山东演出市场的繁荣，也无疑说明了山东的散曲创作拥有着很好的市场

条件。

如果说，在元代散曲创作还主要是依靠演出市场来推动的话，那么，到了明代则又加进了图书市场。显然，散曲作为“歌词”也是可以单独刻印出版的，这就必须依赖刻书业的发达，而明代就正是刻书业繁荣的一个朝代。史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仅开国之初的这一项政策，就为明代刻书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之迅速繁荣起来。可以说，有明一代的书籍生产之盛，是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过去正史中的《艺文志》记录的都是一代藏书之盛，而《明史·艺文志》记录的则是一代著述之盛。这就不仅反映出明代的撰著之多，也反映出明代的刻书之盛。其中，当然包括刻印的俗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曲等等。例如在山东，李开先的第一本小令集《卧病江皋》就是由他的学生高应玘主持刊刻，第二本小令集《中麓小令》就是由他亲自主持刊刻。李开先曾在《诗外微檠序》中说：“【傍妆台】百曲（即《中麓小令》），中麓子归田后出于一时口占，恐其久而忘记，笔之于书；又恐其久而散失，锓之于梓。自愧草率，幸而偶投时好，和之者奚啻数百人？……刻之者奚啻数十处？”他在《市井艳词又序》中还说：“词出一时狂兴，聊以备客侑觞，不意邑人有录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然录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焉，刊者多半，焚者无几。”这些资料都可以说明，在明

代刻印出书是非常方便的事情，私人刻书已经是蔚然成风。除李开先之外，山东的许多散曲家都有私自刊刻的散曲集问世。无疑，这也是明散曲得以流行、得以发展繁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原因。

下面再来看元明散曲山东作家群本身的情况，主要是创作心态。

在元曲创作中，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杂剧作家多为下层社会的文人，主要是由于元统治者采取了歧视性政策，他们大都绝意于仕进，就以杂剧创作为谋生手段与精神寄托；而散曲作家则多为上层社会的文人，或者为官，或者隐居，他们起码没有衣食之忧，因而散曲创作不过主要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元人钟嗣成有一部书目笔记性的著作《录鬼簿》，里面记载的主要是杂剧作家及其作品，但是也涉及散曲，例如，其中就提到山东东平的赵君卿、陈彦实等人，说赵君卿："公讨论经史，酬唱诗文，及乐章小曲、隐语、传奇，无不究?"说陈彦实："公于乐府、隐语，无不用心。"这里提到的"乐章小曲"和"乐府"都是指散曲，可见赵、陈二人也是散曲家，而且在这方面造诣很深。书中为赵君卿和陈彦实写的【凌波仙】吊曲分别是：

闲中展手刻新词，醉后挥毫写旧诗，两般总是龙蛇字。不风流，谁会此！更文才，夙世天员圆

姿。感夜雨，同窗梦；叹秋水，两鬓丝；住人间，能有几时？

府垣岁月露忠肝，宪幕冰霜岂汗颜，何其蹇蹙生谗间！自甘心，愿就闲；转回头，梦入槐南。后会何时再？英魂甚日还？望东南，翘首三山。

这些赞词，突出了两位散曲家“闲中”、“醉后”的“风流”、“天姿”，以及“自甘心，愿就闲；转回头，梦入槐南”的创作心态，可以说，这样的描写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散曲作家的主体性特点。

事实上，散曲作家即使是做官也不把官职看得多么重，因而辞官不做或者征召不就的事情经常在他们身上发生。从上引赞词可以看出，陈彦实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位。而在这一方面更有名的则是张养浩，还有刘敏中，他们都有不愿做官的经历，甚至不止一次。至于他们的相关情况，本书后面还要专门说到，这里只是以他们为例，阐述他们所具有的同样的创作心态。请看张养浩的【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哪一个不遇灾难？　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乾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